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洪子诚 主编

学习对诗说话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洪子诚 主编

学习对诗说话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习对诗说话/洪子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ISBN 978-7-301-17243-8

I. ①学… II. ①洪… III. ①新诗-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8786 号

书 名: 学习对诗说话

著作责任者: 洪子诚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243-8/I · 223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mm × 1230mm A5 9.125 印张 204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缘起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2005 年成立以来,重视新诗研究刊物、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新诗研究丛书”和集刊性质的《新诗评论》,受到诗人、诗歌批评家、新诗史研究者和诗歌爱好者的欢迎。

从今年开始,在“研究丛书”之外,拟增加“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的项目。相较于“研究丛书”的侧重于新诗理论和诗歌史研究的“厚重”,“批评文丛”则定位于活泼与轻灵。它将容纳诗人、诗歌批评家、研究者不拘一格的文字。这一设计,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诗歌研究、批评领域,重视理论深度、论述系统性和资料丰富翔实固然十分重要,但更具个性色彩的思考、感受,和更具个人性的写作、阅读经验的表达,同样不可或缺。在力图揭示事物的某种规律性之外,诗歌批评也可以提供个别、零星、可变的体验——这些体验与个体的诗歌写作、阅读实践具有更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为那些与普遍的规范体系或黏结、或分离的智慧、灵感,提供一个表达的空间。除此之外的另一个理由,是诗歌批评“文体”方面的。也许相对于小说研究、文化批评,诗歌批评、阅读的文字,需要寻求多种可能性和开拓,以有助于改善我们日益“板结”、粗糙的“文体”系统和感觉、心灵状况。

写作这样的文字,按一般认识似乎比“厚实”的研究容易得多。其

实,如果是包蕴着真知灼见和启人心智的发现,透露着发人深思的道德感和历史感,并启示读者对于汉语诗歌语言创新的敏感,恐怕也并非易事。

这样的愿望,相信会得到有相同期待者的理解,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洪子诚

2010年1月

序

这个集子收入我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最近谈论当代新诗的文字。除最后有关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几篇之外,其他的均按照写作(发表)时间先后排列。本来是打算用“门外谈诗”的题目,不过,它已经被邵荃麟先生 1958 年的那篇著名文章用过了。现在这个书名,来自我 1998 年的一篇短文《如何对诗说话》。当时写这篇文章,是有感于诗歌圈内、圈外有些人在谈论新诗(尤其是当代新诗)时的那种轻慢、草率的态度。其实,“如何对诗说话”,更主要应该是说我自己。所以,这里便用“学习”替换了“如何”这个词。

“对诗说话”在我这里之所以成为问题,是深感“说诗”(这里当然指新诗)也不是那么容易。除了视野、文化知识方面的条件之外,智慧、灵性、想象力、语言感觉等方面,比起谈论其他文类似乎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一定的诗歌写作实践,诗歌批评有时候总是隔靴搔痒。可是,我恰恰是一个曾经想写诗,却始终没有写出一首像样的诗的人。因此,这些年虽然以当代诗歌作为自己教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在它面前却总是战战兢兢。在这样的情境下,诗在这里便保持了它永远的神秘感,我也保持着对于新诗,对于新诗诗人的敬畏。

读了这个集子,明眼人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的“附属”的性质。集中的大部分文字,是撰写当代新诗史的附带,或延伸的产品,很少是

带有“原创”性质的诗人研究和诗歌文本批评。这个现象,在我是了解自己缺陷之后的自觉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依靠批评家的那些“原创性”的成果。当然,我有自己的选择与辨析。以这样的情形看,这样的写作是属于“避重就轻”的那一类。

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新诗总是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持各种理由的批评、责难,但是我始终保持着对它的亲近感。吴晓东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的上百年的新诗恐怕没有达到20世纪西方大诗人如瓦雷里、庞德那样的成就,也匮乏里尔克、艾略特那样深刻的思想,但是中国诗歌中的心灵和情感力量却始终慰藉着整个20世纪,也将会慰藉未来的中国读者。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20世纪,如果没有这些诗歌,将会加重人们心灵的贫瘠与干涸。没有什么光亮能胜过诗歌带来的光耀,没有什么温暖能超过诗心给人的温暖,任何一种语言之美都集中表现在诗歌的语言之中。”作为一个受到新诗慰藉的读者,我愿意呼应这段话所表明判断。

洪子诚 2010年2月,北京蓝旗营

目 录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缘起	(1)
序	(1)
同意的和不同意的	(1)
旧文一篇：“对本书的几点说明”	(8)
阅读一组短诗	(18)
“重写诗歌史”？	(43)
几则有关顾城事件的札记	(46)
序《90年代中国诗歌》	(53)
如何对诗说话	(56)
我和“北大诗人”们	(60)
《新诗三百首》中的诗歌史问题	(66)
谈90年代的诗	(73)
序《在北大课堂读诗》	(77)
当代诗的发表问题	(85)
一首诗可以从什么地方读起	
——谈北岛的诗	(90)
谈《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115)
漫谈上海的“先锋诗歌”	(120)

诗歌现状答问	(124)
叶维廉的《中国诗学》(增订版)	(129)
诗歌记忆和诗歌现状	
——在北大通选课“当代诗歌与当代文化”上	(132)
序《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	(150)
几种现代诗解读本	(156)
《回顾一次写作》前言	(171)
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	
——《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	(174)
殊途异向的两岸诗歌	
——《中国新诗总系·60年代卷》导言	(188)
《中国新诗总系·60年代卷》后记	(219)
诗评家林亨泰印象	(222)
朦胧诗和朦胧诗运动	(233)
朦胧诗纪事	(255)
关于第三代诗	(261)
第三代诗纪事	(274)

同意的和不同意的^①

这篇涉及个人创作历程、风格演化、诗坛现状的文章,表现了公刘一贯的认真、坦率、直言不讳的特点。就他对我国诗歌现状所表示的意见而言,有些部分很能引起我的共鸣。例如,我一直迂腐地认为,写诗,做一个诗人是极不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有点近于“神圣”。然而,在一些人那里,似乎是别的干不成(写不成散文、写不成小说)才去写诗。因此,中国今日诗人之多,确实令人吃惊:这一事实本身,就无法弄清楚究竟是“形势大好”,还是隐伏着致命的危机。又例如,公刘在文章中,竭力提倡真诚,反对作伪,强调诗的创作与诗人的生活和人生态度的关系。对这一看来好像已经过时了的命题的重申,我看也不是无的放矢。十多年来,诗人们在诗的语言和艺术形式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有成效的试验。但是,不见得有许多人,都把这种试验看做是创造深入把握对象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形式、技巧上的诱惑,有可能转化为压迫我们的力量,导致忽略、忘记一些基本的因素。作为一个诗人的人格和生活质量的问题,现在很少有人提起,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例。我们常谈诗人的生活体验,对于什么是“体验”,狄尔泰的见解值得重视。他强调体验与生活之间的共生性和体验的内在性,把人的

① 《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发表了诗人公刘的文章《从四种角度谈诗与诗人》,表达他对当时的中国大陆诗歌现状的看法。《文学评论》1989年从第1期起,开设“‘当代诗歌价值取向’笔谈”的讨论专栏。这篇文章刊于1989年第1期的讨论专栏。

这种认识方式,看做是直接与人有限生命与价值超越的关系相关。在他看来,体验的要素与生活本身的要素,与感性个体的诞生、经历、命运、死亡,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只有从自己的整个生活和命运出发来感受生活、反思生活,才能达到“体验”的深度。因此,诗的创作的优劣成败,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决定于诗人自身内在生活的结构,决定于他的精神境界,决定于他对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探求的执著程度。以此反观我们的诗坛而产生深深的忧虑,那时很自然的事。

不过,对公刘文章的另一一些看法,也存在一些疑问,需要提出来讨论。我指的是诸如诗与政治的关系及对80年代诗的发展进程的评价等问题。诗与政治的关系,是贯穿中国新诗运动史的持续性主题。这个“古老”的问题好像已经解决,实际上仍是我们驱赶不去的梦魇。我们大致可以同意这样的说法:对“政治”一词的理解正在变得宽泛,而从社会发展趋势上看,“政治的渗透度越来越得到了强化”^①。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得出如公刘所主张的诗与政治必须保持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的依据。面对这样的现象,将会有不同的反应和态度。将对诗与政治的关系的态度划分为两大派并不恰当,有些削足适履;但如果一定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站在所谓“淡化”政治的那一边。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淡化”,不是可以简单理解为诗不与政治沾边,理解为“明明生活在政治氛围之中,却偏要创造真空”。“淡化”也不是说诗就不能处理政治性题材,诗人一定要不食人间烟火,不关心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当然,也不是出于把政治

^① 本文的引文,如无特别注明,均引自公刘的《从四种角度谈诗与诗人》。

笼统地看成卑污而必须远离的动机。所谓“淡化”，其实就是维护诗的自主性，就是摆脱政治的束缚而实行的分裂，而建立与政治传统脱离、对立的诗的独立传统。人们需要诗，并不是为了它能解决什么政治、经济问题，能对它们做出任何值得重视的分析，提供什么可靠的结论。那种把诗作为“武器”，要它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发挥重要政治效应的期望（包括诸如掀起“街头诗”运动，要求诗为改革鼓吹等等），都是无法得到经验证实的假设或幻觉。在历史上，既是杰出政治家、革命者，又是出色诗人的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没有。不过，他至少是不应以写诗的方法（思维和表达方法）来从事政治活动，也不应以政治规范、标准来写诗。正因此，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是超脱政治规范的动人的诗，而《念奴娇·鸟儿答问》等则是以诗的形式对政治观念的蹩脚图解。公刘同志十分厌恶那些“为各个时期各个领导人的或者彼此承续或者互相矛盾（还有自相矛盾）的政策条文乃至言论、批语服务的诗歌”，并把这类作品的产生，正确地归结为是“出于对功名利禄的贪欲野心”，“百分之百的愚昧无知和个人迷信”，“娼妓式的淫邪下贱”以及“纯粹的恐惧”。但是，事情还有更复杂的方面。在当代中国，诗人写出赞颂不该赞颂、抨击不该抨击的政治性作品的缘由，至少还根源于诗与政治混淆这一点，根源于诗与政治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的事实中。当代诗人郭小川无疑是最见“真诚”品格的诗人之一，然而，当他无法解决政治性要求与艺术自主性的冲突的时候，他也无法避免在诗上的严重挫折和失误，无法避免“为各个时期各个领导人”的政策条文、言论做图解的可悲境地。公刘在文章中提到闻一多等人。的确，从政治观点看问题，“早年的”闻一多、戴望舒、何其芳不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从诗的领域看，从诗的美学贡献、建树看，则也只

有“早年的”闻一多、戴望舒、何其芳才可以被称为真正的诗人。在他们后期的生涯中,诗已经或逐渐在迷失。诗与政治的纠缠,使他们自愿地或无意地失去了诗,这种情况,或许可以为刘再复说的“何其芳后期现象”的研究提供一个思考的方面。

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难以捉摸的世界中,我们对周围环境、对自身的把握的信心越来越薄弱。科学技术取得的飞跃进展,社会日益商品化的进程,物质欲求的膨胀,既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变革的动力,也使人的灵性丧失的过程加速,使人的灵魂和感性能力钝化和粗糙化。对于这种状况,诗人大概感受最为敏锐。除此之外,在中国,还有另一特殊的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政治对整个生活长期的渗透和人们承受的巨大政治压力,使人的心灵受到严重扭曲,精神自由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在现实生活缺乏诗,没有“神话”的时代,诗与“神话”就需要诗人来创造。正如法国诗人佩斯所说:“在神话崩溃后,神的灵魂隐蔽所,或者说应该说它继续乘坐的马就成为诗。”人们对诗表示敬意,给诗人以荣誉,是因为诗所关注、所寻求的,是与物质的社会活动不同的精神领域,是人的内心世界,是穿过种种有限性的、暂时性的因素(包括政治等因素)的掩盖、束缚,去寻找人的灵魂的归属和位置,去用诗的语言,建构一个与现实的生存世界相对立的诗的世界,一个使人的灵性得到发挥、人的心灵自由得到确立,使生存个体从暂时性的生存体制中得到解脱的世界。因而,对于嵇康、阮籍、陶潜、王维等的“若干空灵、玄远”的作品,如从政治的角度看,也许正如公刘所说,是“彼时彼地的‘政治’的产物”,但从诗的独特领域看,则正表现了这些诗人从现实人生出发,对人的内心精神价值的寻求,对一种理想的人格和理想的情怀的构想。不仅是陶潜、王维等人,人类的

优秀诗篇，整个诗的历史，不正是企望超脱有限生命的人们的精神探索、重建有意义的世界的历史吗？诗人失去对这一责任的自觉，离开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而以暂时性的政治作为诗的目的，他也就离开了真正的诗。在 40 年代初期，冯至在里尔克式的冥想独思中去领会、探索生命的意义，思考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体生命的延续与蜕化等关系，表现生命回到单纯质朴的原初状态的动人向往。诗人幽微的思绪和稍纵即逝的心灵搏动，在以质朴的语言构成的意象中得到凝定。这是冯至作为一个诗人所达到的高度，但是，在 50 年代，他自愿地让诗屈服于政治的因素，他无法再写出获得诗的美学升华的富于魅力的作品。他的创作，只能成为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种“社会的碎片”。也许，再次深入研究我国众多现代诗人的创作历程，有助于我们对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的认识。

基于上述的这些理解，我对近十年来中国诗所走的路，在描述与评价上可能与公刘同志有所不同。公刘文章中论及的一批曾在 50 年代遭难而后“复出”的中年诗人，他们在新时期诗歌的发展中无疑起到重要作用，公刘对这一诗歌“群体”的特征和总体风格的归纳，也确是真实的。他们的受难，实际上与他们的创作在 50 年代突破某一方面的统一创作“规范”有关。被迫长时间离开诗坛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巨大损失，却也使他们在精神和诗艺上与当时僵化的诗歌事实保持一定距离。他们在“复出”之后的作品，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们以自身坎坷的经历印证着社会史和诗歌史的曲折道路；他们创作中的“归来”主题和以痛苦为主调的复杂情思，使当时中国文学普遍性的历史反思，以“个人化”的方式，得到有一定深度的表现，也使诗在寻回失去的个性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历史的断裂与重续，凝定在个人

生命里,并且在他们重续自己的曾被阻断了的的社会理想、美学理想和歌唱方式中展现出来。不过,这一“诗群”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他们的重要弱点之一,是难以拓展的社会—政治视角和政治理想主义的世界观,以及由此制约的社会—政治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这限制了他们的诗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领域,也妨碍了他们开启“内视世界”,达到透视精神、心灵世界的深度。近些年来,他们在诗的创作上出现的迟滞现象,反映了这一“诗群”在变化了的社会情势与读者期待面前的困境。我们不必讳言这一点:他们中多数人的诗的生命力已变得萎弱,他们转而写杂文、评论、小说,与这一点有关。在实际上,80年代当代诗歌探索、革新的任务,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青年诗人承担的。不管对他们作何评价,对他们中一些人的作品和行为有何忧虑和非议,有一点必须承认,他们的努力,在使诗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促进“诗的自觉”不断深化上,起到更重大的作用。他们自觉地让诗摆脱政治的羁绊,即使是70年代后期那些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作品,也不同于“复出”的中年诗人当时的创作。前者更鲜明地表现了从维护、寻求人的尊严、精神价值出发的特点。80年代初,北岛、顾城、江河、杨炼等不约而同地提出建立“诗的世界”的问题。这预示了今后十多年时间里我国诗的变革的基点和大体路线。青年诗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逐渐建立了这样的诗歌观念:一方面,诗是由诗人创造出来的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另一方面,诗又是超越诗人自我、同时也超越现实时空的特殊世界;这个世界,是审美的艺术世界,既是对人的感受力和表现力的一种发现,又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和拓展。诗人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但又须从这点出发,超越现时性的现实与自我,建立起诗人对人类精神领域负有使命的自觉。这一与政治分裂的诗歌观念

的确立,在有几十年历史的中国新诗史上,显然是个重要转折。对它的意义,应有足够的估价。

1988 年 9 月

旧文一篇：“对本书的几点说明”^①

一 缘起及经过

1986年春天，在谢冕的主持下，我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开设“当代诗导读”的专题选修课。课程探讨的对象主要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诗潮的一些有代表性而又比较难懂的作品。课程的进行采取了这样的步骤、方法：先由主持人对新诗潮的发生、发展的状况，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前景，做比较全面的描述、分析。在此基础上，参加者每人选择一至若干首作品进行准备，并轮流在课堂上报告他们的阅读心得，对作品进行“解读”。然后，听课者对报告加以讨论：或对观点有所补充，或提出不同理解，或对采用的方法有所质疑。由于怀着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学习和研讨的真诚态度，讨论认真而热烈，也融洽。在讨论之后，每位报告人将自己的心得写成文章，有一部分当年就发表于安徽的《诗歌报》和山西的《名作欣赏》

^① 1988年，谢冕和我将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当代诗导读”课程成果编辑成书，交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已决定排版付印，但由于第二年（1989）发生的许多事情，和书中收入对北岛等作品的阐释，便被无限期拖延，最终未能问世。这篇旧文，便是我为这本书（《当代诗歌导读》）撰写的序言之二（序言之—由谢冕撰写）。今年（2009）春天，偶然从旧稿中翻出。重读一遍，虽然观点已显陈旧，谬误之处也显而易见，但因为体现了80年代后期我对诗歌的情绪、观点，所以还是作为“资料”，不做改动收入本书。